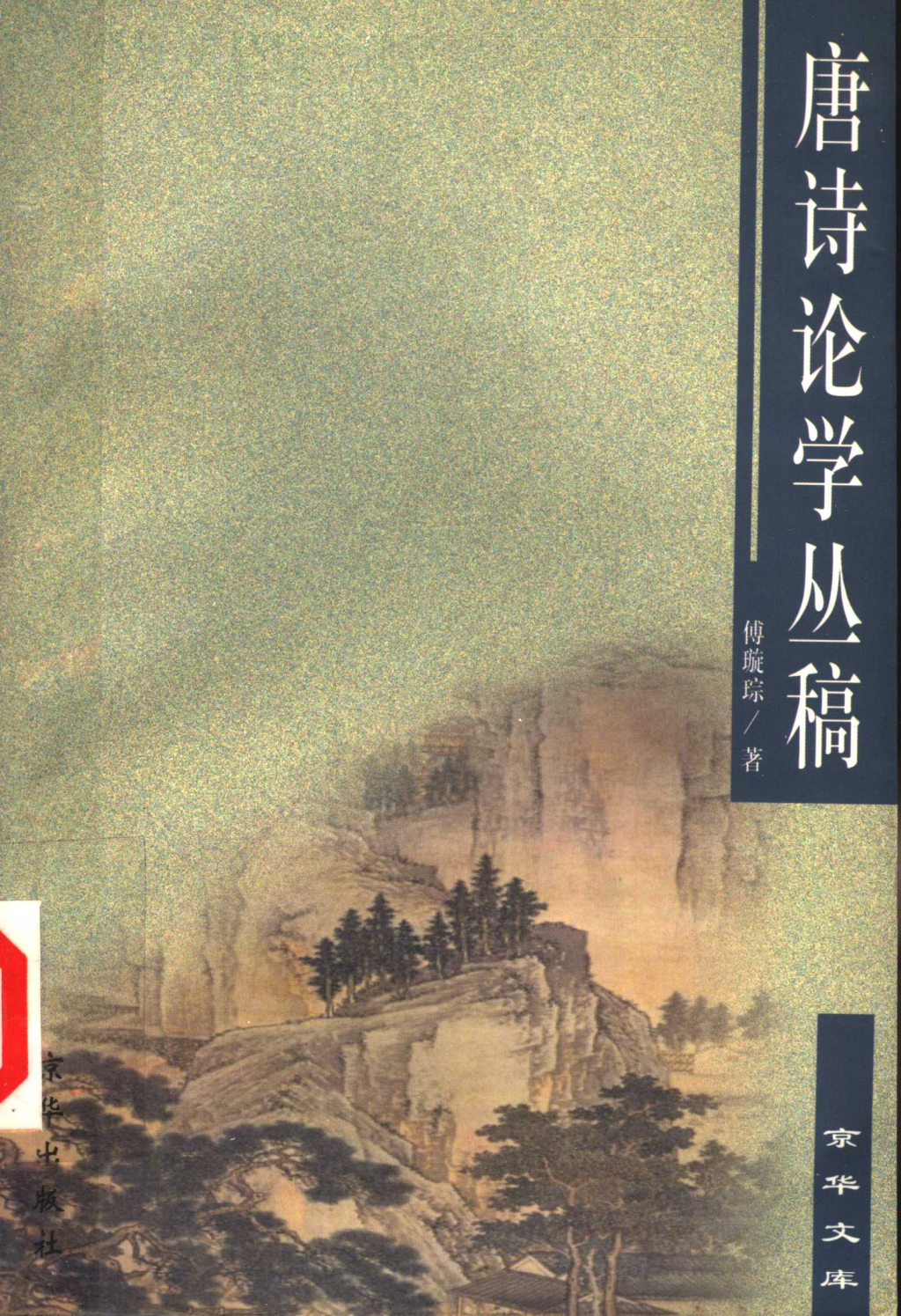


# 唐诗论学丛稿

傅璇琮 / 著

京华文库

京华出版社



· 京华文库 ·

# 唐 诗 论 学 丛 稿

傅璇琮 著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论学丛稿/傅璇琮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1  
ISBN 7-80600-238-3

I.唐… II.傅… III.①唐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072 号

·京华文库·

**唐诗论学丛稿**

傅璇琮 著

责任编辑:刘明 责任校对:晶华

技术编辑:凌敏 封面设计:金苹果工作室

---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

国务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8.75印张 33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00-238-3/G·192 定价:34.80元

## 罗宗强

近十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作为这进展的主要成果,就有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和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这些著作,在唐文学研究领域里可以说有口皆碑。其中的每一本,都有它的意义。《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时,我们刚摆脱古典文学研究的单调浅薄的模式不久,这部著作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它考证了三十二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活动于大历时期的。对于大历时期的诗坛,学界向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面貌也就长期不明,像刘方平、戎昱、皇甫冉、皇甫曾、耿纬、李端等人,前此还很少有人认真清理过,璇琮先生是系统给予研究的第一人。而对于前人已研究了诗人,他也提出新证,纠正了不少错误。但是,这部著作的主要功绩,我以为不仅在诗人事迹的清理上,而在于它通过诗人事迹的清理所展示出来的诗人诗坛风貌。考其生活之播迁,而往往察其诗风;考其交游而往往触及诗人群落。它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超出以往研究模式之外的全新问题。我总觉得它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生平事迹考辨的东西,它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整体研究。

这种研究特色在《李德裕年谱》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部年谱里,谱主的事迹完全织入到围绕牛李

竞争而展开的历史画面里。因此有研究者提到可以把它作为一部牛李党争专史读。它涉及的其实是当时的整个政局与牵涉在这个政局里的各种人物的活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它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的背景中，有谱主也有众多作家的活动、心态。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如果联系到这个集子里的一些文章，那就可以发现，璇琮先生是明确地朝着整体研究的方向开展他的工作的，事迹考辨也好，谱录编写也好，某一领域的研究也好，目的都是认识一个时期文学的总的风貌，对这风貌作出解释与评价。这种整体研究，如果概括的说，似乎可以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

但是，这又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它是从传统的考据方法中生发出来的，非常重视实证。它非常注重个案研究，把个案研究做得很深，从个案研究中认识历史的整体联系，认识历史的运行线路。《李德裕年谱》和《唐代科举与文学》都是很出色的个案研究，一个以人，一个以事，而两者的结果都是呈现一个时代的某一侧面的风貌。璇琮先生的个案研究是做得很精深的，这个集子里他与李珍华先生

合写的关于王昌龄和殷璠的两组文章也是例子。关于王昌龄，由于史料缺乏，许多问题长期以来若明若暗，无法深入下去，而这组文章却运用可以找到的一切材料，把问题解决得相当精采。《诗格》作者是否为王昌龄的问题，向来争论很大，都因史料不足难以论定。两位先生从皎然在《诗式》中提到《诗格》的内容和空海《文镜秘府论》大量引用《诗格》，论证《诗格》作者在贞元初已为皎然所认定，在元和初又为空海所深信。这些情况学界虽已往也注意到，但如此尽详的论述却为前人所未曾。而我以为最细致的工作是傅、李两位先生以《诗格》所引例诗与王昌龄的行踪比勘，提出了《诗格》可能作于昌龄贬龙标尉时。这些例诗所提供的线索是极细微的，为以往学界所忽略，而他们却注意到了，给了论证。可以说，凡《诗格》本身所能提供的线索，几无遗漏一一检出加以辨析。当然现在还可以对他们的结论提出某些怀疑，但是要证明非昌龄所作，则也提不出有力的证据。同样深见功力的考辨，是关于王昌龄的行踪的。以往对于王昌龄是否到过边塞，何时和到过何处？均黯而不明。两位先生以极有力的证据，提出王昌龄曾经由甘肃靖远附近的白草原，由西向东，经萧关到固原，过六盘山，东到今天的平凉城，然后顺河南下，经凤翔、岐山一带，到扶风，直至长安，时间则在开元十四年之前。王昌龄行踪的这一有力考定，就把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的创作情形弄清楚了。对于《河岳英灵集》的研究，同样表现出甚深的功力。前人研究《河》集，从未认真研究过它产生的背景，

而傅、李两位先生却系统清理《河》集編集之前唐人选唐诗的种种情形，从中论证文学观念的演变对于殷璠编《河》集的影响和《河》集所反映的文学观念的意义。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河》集的音律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认为《河》集《序》中所说的“词有刚柔，调有高下”和“词与调合”，可能讲的是诗歌的抑扬律，而不专指平仄律。关于王昌龄和殷璠的两组文章，无疑是以传统的考据方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却是唐代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诗格》的研究不惟涉及到对于盛唐诗歌思想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于唐代诗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考察，这种意向傅先生在为李珍华先生点校的《五代诗话》写的序中有进一步的表述。而对《河》集音律说的解释，则涉及到对盛唐诗歌格律状况的重新清理与认识。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精深，是璇琮先生治学途径的基点；但是他又没有停留在这个基点上，而是由这个基点进入整体，由精深而入于博通。

精深不易，需要识力也需要功力，要对个案的研究选点得当，材料的挖掘少有遗漏，研究的现状了如指掌，历史的真实面貌了解近于准确，需要有坐下来做基本材料工作的功力与毅力。这一点璇琮先生在《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中有深刻的论述，他说：“研究历史，一个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

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璇琮先生的研究正是走着这样的路。

但是博通更难。博通不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而且需要有一种整体审视历史的能力。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错综纠结、黯晦不明中看到症结所在，看到真相。璇琮先生的著作说明他是走着博通这条路的。

我以为，璇琮先生以其精深与博通从事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的学术传统里，文史本来不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搞文学研究的人只注意文学自身，对于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波荡，宗教与哲学的情形，社会的心态，与不同地域的风情等等不予理睬。而不顾及这些，事实上便也撇开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无法理解与解释文学的不同特点。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承接文史不分的传统，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审视文学的特质，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治学途径。璇琮先生的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

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发展，但也曾经被彻底否定；同时，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也反复被讨论过，意见纷纷。这里提到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当然不会是大家都认可的最佳途径。细想起来，自古以来关于治学的目的与方法似乎就未曾有过统一的认识。大略说来，每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社会风云激荡之际，志士奋起，治学的目的往往重在



为时所用，略其小而取其大；而当社会相对稳定或者停滞时，则治学者常常更带着纯学术的色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身处同一时代，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不同。当然这只是大略而言的。但由这大略的差别，也就生出来治学方法的不同，有种种的争论，有种种的是非褒贬。我想，这种种的争论，种种的是非褒贬，是会还要永远继续下去的吧！至于民族文化的承传，种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目的的是非功过，恐怕只好留给历史去评说了。但是有一点，不论何种的目的与方法，欲成大气候者，我以为有一点是必备的，那就是求实。虚荒浮躁者，虽可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费些小力气而获浮名于一时，但时光流逝，消声匿迹亦随之。求实则较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血汗较比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求实也真不易，需要有一种为学术献身、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与决心。这个集子里璇琮先生为汝煜兄的著作写的两篇序言，真是使我感慨万千。汝煜兄就是璇琮先生所称赞的脚踏实地做学问的那种人，现在他已经过早地去世了！青灯摊书，在贫困中匆匆度过一生，正是许多献身于学术的有志之士的归宿。去年去世的郭在贻兄，也是这样的一位。他逝世之后，每当我重读他的数十封来信时，便会怆然想起他墓志上的话：“卅载清贫，二子尚幼，可不痛哉！”上天真也不公，浮猾钻营而富贵寿考者往往有之；而勤谨耕耘者，却常常贫寒困顿、英年早逝。季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后如何，本与己无干；生前艰辛，

却确实需要有一番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学术，也就在这种献身精神中得到发展。同时这种献身精神自身，也常常给献身者以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视艰难的学术之旅如歌如诗，虽鞠躬劳瘁而始终如醉如痴。

傅璇琮先生年来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提倡一种求实的学风，我觉得这于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助益的。他也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奖掖后进，激励同志；在唐文学的研究中做了广泛的组织工作，这同样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助益。对于他的学问和为人，我钦慕已久，现在他编集付梓，嘱我为序，我学问无成，岂敢多所论略，盖因钦慕之情而欲谬托知己以自重，故说了上面的一些话，以应先生之命。

1990年3月25日

于南开大学

陈允吉

新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文革”留下的荒漠边缘起步,在充满着渴望和求实精神中探索,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十个年头。一门发达已久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其自身的拓进,并不是一件轻举易蹴的事,这条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冲碰和波折,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步履蹒跚,但它毕竟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正是依靠了众多学术工作者的努力,这十年的古典文学领域,在基础工程建设、材料考订、理论与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部分原来的空白已被填补,学术队伍在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很有质量的研究著作。可以认为,它在这段时间里取得的进展与实际成绩,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目前古典文学领域存在的矛盾相当尖锐。似乎它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使许多同志思想上产生困惑和焦虑。这一门学科的对象与性质,就决定了它同传统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厚的历史积累弄不好会变成一种负担,要在前辈大师高度成就的基础上超越一步又何等的不容易。古典文学研究如何适应变革着的生活现实,它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大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非常关心的问题。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层面是扩大了,但大部分成果还停留在一个不

太高的水准上，研究的总体结构亦不甚合理。研究方法的拓新虽有一些成效，但远未达到促成一门学科全局改观的程度，有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总之，在这个学术领域里并不缺乏丰盛的果实与蓊郁的生机，却没有显示出能够推动它腾跃疾进的巨大活力。

类似这些问题，出现于一门学科的某个发展阶段，这是不奇怪的。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古典文学研究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重要的是应对这种状况有一个恰当的估价。近几年有些人喜欢以夸大的自我意识来表达“使命感”，他们发出了古典文学研究已陷入“僵化”和“危机”的高论，并且断言：“中国有古典文学，没有古典文学研究。”仿佛一门学科就要随着他们的严厉判决而堕入渊底。这种估计违背了基本事实，当然是为大多数古典文学工作者所不能接受的。反之，要是我们满足于现有成绩，无视客观矛盾的存在，产生盲目的乐观情绪而故步自封起来，那也很可能造成古典文学研究长期停滞的局面，同样不利于这门学科的繁荣发展。

科学研究是不断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认识运动，每向前一步都有赖于它内部矛盾的发现与克服，需要我们加强对它本身的认识。从文明的进化过程来说，人类智慧的火光不啻照亮了自己逝去的背影，也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在的处境与探索未来的道路，这对一门具体学科同样是如此。因此，准确了解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状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它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导

扬其中科学性较强的积极因素，抉示出关系到它全局的症结，在进行理论阐释的同时从实践上予以调整解决，是我们在目前应该立即着手去做的一项工作。这种对学科现状的跟踪研究，是提高一门学科研究素质的重要途径，也能使我们较好地把握到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趋向。

对于本门学科的跟踪研究，在古典文学领域是薄弱的一环，特别与它的近邻学科现当代文学领域相比，就显然要逊色得多。我们这里很多成就卓异的专家纵有睿智达识，却习惯于沉浸一境钻研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而不太愿意对周围同行的工作投以关注的一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各守其位，拘囿于自己选择的专题范围，结果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殊不能造成活跃的空气，当然更谈不到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门学科的发展势态了。新时期加强了古典文学工作者之间的沟通，注意了学术资料的积累，并有一些治学经验丰富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射到本门学科的现状研究上面，较早地和其他同志一起涉足于这块需加垦殖的境地。迄于今日，我们还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充分了，但与过去比确有明显进步。一门学科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并提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供人们思考，这是学科具备存在价值的标志。上述这些为以往少见的迹象出现于古典文学领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观念的嬗变。

傅璇琮同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学者，卓有建树于古典文学领域，可以说他在新时期十年所做的一切工

作，都是和这门学科的成长紧密地维系在一起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多部开拓性的力作问世，并且始终怀着对学术文化事业的一片丹忱，为审视、探究古典文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倾注了他的心血。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的《唐诗论学丛稿》一书，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写论文的一部结集。本书收入了璇琮同志论述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三十二篇，分综论、专论和评介性文字三个部分，写作的时间绝大部分是在最近十年里面。这些文章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土壤，议题涉及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作者的本意是通过考察最近十年这一领域的科研实践，力求濯足于活水之中来探测它的流向，由具体到一般而获得科学认知和理性了解，并就古典文学研究应如何发展阐明自己的见解。尽管书中谈得较多的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但由于作者着眼在一门学科的现状与学术史的探讨，其取之也约，其观之也博，兼融文史，识见超拔，所以它在整个古典文学领域乃至史学领域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璇琮同志治学经验既富，对同行的研究工作也多有同情了解，其观察由精微而趋博大，达成了对古典文学这个领域深邃而全面的观照。我们读《唐诗论学丛稿》一书，可觉察到它在论述上最显著的特色，是体现着对一门学科进行严肃认真探讨的整体性。作者在这本书中多次强调指出，实现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科学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必须把这门学科视为一项

总体工程，需要在研究结构上有一个合理的搭配。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体察，认为一个合理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结构，必须具备基础设施和上层架构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各自又由很多具体部门配合而成。在基础设施中间，主要包括文学史和作家作品基本材料的整理，工具书与作家传记的编纂，文学通史、断代史和其他著述的编撰。至于上层架构，则应包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样式的专门研究与批评鉴赏等。这些部门分工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它们之间互相衔接、互相支撑，即使是最微末的配件也要为整体服务。璇琮同志把研究结构看成是一门学科的核心问题，这种洞见卓识，来源于他和其他许多研究者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开展现状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某些偏畸和盲目性，使古典文学各个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俾以形成一股启动这门学科向前拓进的合力。新方法无疑蕴藏着巨大潜能，但更新研究方法的直接目的，也仍然是为了促进它所属的这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的形成。学术史上无数事实表明，那些拓深求索事物内在规律尺度的新方法，只有得到了整个学科合理研究结构的承托和支持后，才能真正付诸实践并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其重大的效益。

拓新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是璇琮同志真诚而强烈的愿望，也许在这个具体的学术领域里，能像他那样为此长时间的倾竭心力的学者尚不多见。现在我们一谈到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拓，就有人会把它归功

于近几年那股“方法热”的启导,这是一种因不了解历史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其实早在60年代初期,当时的社会科学界就已萌动了方法问题的自觉,开始注意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和边缘学科的探涉,在古史领域里还提出过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方法。璇琮同志关于拓新方法的一些考虑,最早亦是酝酿在这个阶段。他因读丹纳的《艺术哲学》而受启迪,即意识到古典文学研究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通过作家的群体研究去考察当时文学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而这样一种研讨,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文学研究的范畴,必须取得史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支持。基于这一认识,使璇琮同志对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状况感到不满足,希望有一种更成熟的研究来改变它的面貌。自此以后璇琮同志一直坚持进行摸索与思考,就在风云迷幻的“文革”十年,人们的正常生活倍受纷扰,他也没有由此放弃自己的探求。在这个过程中他确曾吸收了如陈寅恪、岑仲勉、闻一多等一些前辈大师的“通识”,但更重要的是从他自己科研实践中提炼出来许多真知灼见,并在高度理性的层次上求得融会贯通。他以唐代文学、主要是唐代诗歌为突破口,首先从基础材料工作着手,广泛寻求文学与史学交叉、相互渗透的途径,由此在知与行的结合上,把这种探索推进到一个明确而丰满的境界。

《唐诗论学丛稿》一书辑入的论文,探及研究方法者占很大比重,汇合起来就构成方法论上很系统的见解。璇琮同志这一系列文章,按时间顺序划出一条轨



辙，从这里可见出他这些年来治学上所执著追求的，一方面是要扩大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它的研究内涵，努力摆脱“文革”以前那一套生硬地贴加政治标签的评论模式。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材料工作与深入的个案研究，以防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落入时下风靡的空廓浮泛之论。这两种倾向出现于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但共通的弊病是轻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滋长了意志的任性。璇琮同志确认古典文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其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将古典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史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这种研究不妨称之为对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者掌握和钻研大量史料，通过若干个案的细致分析由点及面，对某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与时代精神取得总体的了解。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作为中介来转递的。某一个时代社会、政局的变动，意识形态的转移变迁，由种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这个时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好也随之而发生变化。作家既是时风激荡的敏锐感受者，又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历史上永流不歇的作家群体的发展，形成了文学作品多姿多采、变演无穷的丰富景观。璇琮同志对于作家群体的研究寄予高度的重视，认为这是考察历史文化意识渗入文学的